

# 鸦片战争 道光帝为何宁愿割地赔偿

鸦片战争时，中国其实还远没到全面失败的程度，毕竟只是在沿海一带跟英军的一支舰队交过手，泱泱大清还有广袤的国土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常备军，一向痛恨洋人的道光皇帝为什么宁愿割地赔款，也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呢？

## 曾强硬禁烟

乾隆年间，鸦片流入中国，嘉庆时已有泛滥之势。对于鸦片的社会危害和经济危害，道光皇帝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，所以，他在登基之后即不断下令严禁。

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前，清政府内部关于如何禁烟有两种观点：一是主张严禁，手段要硬要狠；二是主张弛禁，认为不能太极端，甚至认为可以通过鸦片贸易合法化来增加税收。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，道光帝曾把严禁派官员黄爵滋的奏折发给各省督抚及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将军，让他们发表意见。结果收到29条反馈意见，赞成严禁的仅有8条，反对的有21条，但道光帝毅然采纳了少数派的意见。在林则徐去广东前，道光帝在短短半个月里就召见了19次，商谈禁烟事宜。正是由于道光帝的大力支持，林则徐、邓廷桢等人才得以用霹雳手段在广东等地查禁鸦片。

当虎门销烟的情况传到北京后，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禁烟成绩非常满意，在诏书中指林则徐等人“为朕亲信大臣”，进一步表明支持禁烟的态度。而对禁烟可能引起的冲突，道光

帝并非没有想过，但他不怕。当时，清政府上下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，许多大臣认为，仅凭“天朝声威”就可以“慑服夷人”。

## 不堪重负的财政

紧接着，英国舰队大举入侵，这支舰队的主力是16艘战舰、500多门舰载炮，以及数千人的陆军。从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，双方共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役12次，清军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0万人，英军最多时不过7000人，但英军以少胜多，在北至天津、南到广州的数千里海陆如入无人之境。战后统计，清军共战死约3100人、伤4000余人，英军战死71人、伤400余人，英军因疾病、食物中毒、船只倾覆等非战斗死亡2000多人，战斗死亡人数不足人员损耗总数的3%。

即使这样，中国方面的损失仍然是有限的，死伤合计不到1万人，对于80多万常备军来说，尚谈不上重创，更何况还有4亿多人口可以动员，而战事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，英军的战术基本上是打了就走，除了少数几个地方外，英军并没有占据多少领土。对于一场国与国的全面较量来说，打到这种程度只能勉强算是个开头。然而，道光帝继续往下打的决心越来越动摇，因为他的日子很不好过。

战事一开，各地要钱的奏折就如同雪片般飞向道光帝的御案。在收复定海的战役中，浙江方面提出从藩库临时支出10.5万两白银，不到几天，又报告说这笔钱不够用，要求将原本

协济云南和上解户部的96.28万两截留作为临时军费，为了应急，朝廷只得批准。

英军第二次炮击厦门，闽浙总督邓廷桢奏请从藩库、监道库中再拨银15万两，朝廷诏准。琦善赴广州主持军政事务后，道光帝指示：“所需军费，无论地丁关税，准该大臣酌量动用，作正开销，倘有不敷，迅即奏闻请旨。”琦善立即回奏：“查得各库贮堪以动用之款，现尚堪敷支，唯防夷久暂难以预料。”军情紧急，道光帝下令户部从广东邻近省份临时拨银300万两给广东。

要钱的大臣个个理直气壮，但管钱的人却如坐针毡，朝廷财政仅能勉强维持，能做个“月光族”就算好的了，实在没有余钱可支，再按这样的节奏花下去，问题就大了。道光帝一开始对军费奏请还比较大方，后来就越来越谨慎了。1841年3月，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上奏：“敕部筹备银300万两，内200万两迅速解闽以副支用，其余100万两容臣察看情形，如果必须应用，再行奏咨。”奏折先到户部，户部打了个对折，准备拨给150万两白银，呈请道光帝朱批时，又被减少50万两。1841年8月，英军攻陷厦门，福建方面急请拨款300万两白银，道光帝索性不准。

当时，清军自知在海上打不过对手，于是改在重要江海要塞防守，由于不知道英国舰队的进攻方向，只得处处设重兵死守，人就不够用了，只得从相邻省份调兵。军队开拔需要钱饷，按几万人调防来计算，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

## 无奈签约却打开了魔盒

不给钱还要人家动身去打仗，的确没道理。道光帝的用兵方针是能不动调就不动调，能早些撤防就早些撤防。1840年9月，英国舰队从天津退往山东海面，道光帝赶紧

命令沿海各省撤防，“以节糜费”。

但3个月后，广东局势再报危急，只得又下令增防。1841年7月，奕山在广州谎称取得胜利，道光帝没有核实真伪，就立即下令各省撤防，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一轮进攻，清军来不及重新布防，吃了大亏。

但说起来，还真不是道光帝指挥水平的问题，而是经费捆住了其手脚。鸦片战争期间，经道光帝之手批出去的军费超过2000万两白银，加上其他方面的投入，清政府额外的军费支出超过7000万两。而1842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3714万两白银。这就是道光帝最后选择求和的根本原因，而英国人本来也没有打算就此占领或灭亡中国，所以也愿意接受。

英国人为了打这场仗花了多少钱呢？1843年，英国政府曾就在中国的战争花费问题接受过议会质询，留下了一份对账单。根据这份账单，其总费用是421.5万英镑，在当时约为1263万两白银。

从常识来说似乎有点不通：花1200多万两白银的军费去打仗，尽管打得很顺手，但毕竟也损失了那么多人，要求1400多万两的赔偿，不符合“侵略逻辑”。

究其原因，英国人知道此时的道光帝最关心什么——赔款索要太多，道光帝心疼，如果实在拿不出来，恐怕要死战下去。英国人有比钱更看重的东西，那就是香港的割让，以及通商口岸的扩大。

道光帝关心的，并不是英国人最在意的；英国人最想要的，道光帝似乎也不太关心。《南京条约》在清政府内部有个“万年和约”的称呼，道光帝希望这份条约能就此永远结束噩梦。然而，噩梦没有结束，《南京条约》打开了一个魔盒，中国从此开始了上百年的屈辱史。

据《同舟共进》 陈忠海/文

## 武汉坤伶“小京班”兴衰始末

1903年，汉口后城马路与歆生路（分别为今天的中山大道与江汉路）交汇处出现了一座群仙茶园，1907年改称怡园，是最早的京剧坤班演出场所。那时，京剧演员男女不许同台，坤班来汉只能在特定的几个茶园演出。坤伶地位低、受歧视，演出的戏被称之为“髦儿戏”，多少带有轻蔑的意味。

坤伶多是苦出身，均未进过正规科班，以“家学”为主。为了生计她们学会一些唱段后，便去茶园慢慢磨炼，直至小有名气。解放初期，这些女演员慢慢聚集起来，在江汉路与江汉二路交汇处（今武汉中心百货商店旁）的银都茶楼固定演出，一些女演员还迅速蹿红。

1951年1月，武汉市戏曲改进协会成立，下设京、汉、楚、评、豫、越等分会。5月，根据政务院《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，推进以“改戏，改人，改制”为中心的“三改”工作，由周信芳任总团长的中南京剧工作团，将武汉的京剧事业再一次推向巅峰。1952年，因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，中南京剧工作团划归武汉市文

化局管理，改名为武汉市京剧院，从此开启了其固定演出场所民众乐园的改革序幕。

随着私营剧场公有化的推进，银都茶园于1953年12月完成改造，定名武汉市青年京剧团（又称“小京班”），整体迁入民众乐园。与其他驻场演出团体略有不同，青年京剧团经营“自负盈亏”，采用与民众乐园折账的方式，规定了茶钱的标准，所有演职人员实行薪金制。

据老戏迷回忆，“小京班”每天下午、晚上各一场戏，演出很敬业，非常受欢迎。剧场常常坐得满满当当，想要个好位子必须提前占座儿，一些熟悉的观众会偷偷塞些糖果给演员的孩子帮忙占座，若是碰上她们的拿手戏，走道上都站满了人，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“女扮男”难以为继，加之民众乐园歇业，境遇每况愈下。1970年元月，青年京剧团大部分演员下放至武昌县（今江夏区），与武昌县楚剧团合并组建新的武昌县京剧团。这个中国最后的京剧坤班，就这样结束了历史使命。 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